

文化脉动

农家书屋10岁了,这所超大“图书馆”开到了中国60多万个村庄,让6亿多农民告别了看书难、看报难的困境,60多万家农家书屋共向农村配送图书10亿多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0.13册增长到1.25册——

让农民从看上书到爱上书

本报记者 张贺

10年辛苦不寻常

中国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量超过了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的总和。10年来,这所超大“图书馆”把“分馆”开到了中国60多万个村庄,让6亿多农民告别了看书难、看报难的困境,被农民誉为“家门口的图书馆”“致富好帮手”“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它就是农家书屋。

从2007年全面推开至今,农家书屋走过了整整10年。10年来,60多万家农家书屋共向农村配送图书10亿多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0.13册增长到1.25册,增长了近10倍。

在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之前,一些学者曾用“文化荒漠”来形容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的文化生态。据统计,2004年我国农村识字者家庭中有45%没有藏书。2007年,不包括学生的课本,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仅为0.1册。文化上的落后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棉花坪乡沙子田村坐落于大瑶山之中,四面环山,云雾缭绕,交通不便。在棉花坪完小上学的小学生胡佩琳很爱看书,家里有40多本书,但大部分是她奶奶从外面捡回来的。“奶奶总是叮嘱我多读书,长大以后到县城当老师。家里的那些书我翻看了很多遍,都破旧不堪了。但村里有了农家书屋后,我奶奶就不再去捡书了,我现在每天都去书屋看书。”胡佩琳说。

农家书屋改变了农村阅读资源匮乏的现状。根据建设要求,每个农家书屋按照2万元标准建设,配备图书不少于1500册,品种不少于1200种,报刊不少于2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建设热情高涨,到2012年全国有条件的行政村全部建成农家书屋,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3年。

在农家书屋工程实施前,全国除极少数有条件的农村家庭有读书看报的习惯外,大部分农民群众谈不上有文化生活和阅读习惯。10年来,在书屋的陪伴下,很多农民渐渐熏染书香,培养起读书看报的习惯。这些书屋,犹如灯塔,照亮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又如精神的火炬,点燃了农民们阅读的热情。2011年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建有农家书屋的行政村,46.5%的村民表示使用过农家书屋,24.6%的村民表示每月至少使用一次农家书屋。平均来看,人均每年使用农家书屋10.35次,这一数据比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之初的2007年人均6.7次的年使用频率提高了54.5%。

阅读改变命运

许多农民正是在农家书屋里学

到了致富的技能。湖北神农架林区红花村养猪大户吴起林通过《猪病的防治技术》,从最初的10头、20头,发展到100多头,年收入达10万多元。安徽省来安县张山乡桃花村村民陈大勇采用《韭菜病虫害防治知识》教授的方法,科学合理用药,有效防治病虫害,在产业调整的情况下承包种植了50亩韭菜,运用科技知识走上致富之路。

“发挥好农家书屋的作用,可以给农村孩子带来福音。”在201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汤素兰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湖南一个农民作家主动要求把农家书屋建在他家里。经过一些少儿出版社的捐助,现在这个书屋已成为藏书丰富的少儿图书馆,乡里很多孩子放学后去那里看书、写作业。”

农村的未来在农民子女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家书屋对农村少年儿童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吉林前郭罗斯镇中心中心小学的小学生金俊贤说:“没有书屋的时候,我们放学就和小伙伴出去玩或者看电视,从来没有看书的习惯,而且也没有书给我们看。自从村里建了农家书屋,我和小伙伴们就多了一个去处,去了几次以后慢慢爱上了看书。”

一些农家书屋建设较早,阅读活动开展较好的地区,其农村学生的学习情况要明显好于农家书屋建设之前。自2010年,许多自小在安徽省滁州市蒋集镇农家书屋读书看报的学生陆续考上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流学府,蒋集镇中学的重点高中升学率也不断攀升,2005年考入示范中学的人数仅21人,到2013年增长到98人,是8年前的4.6倍,总成绩达到全县同类学校最好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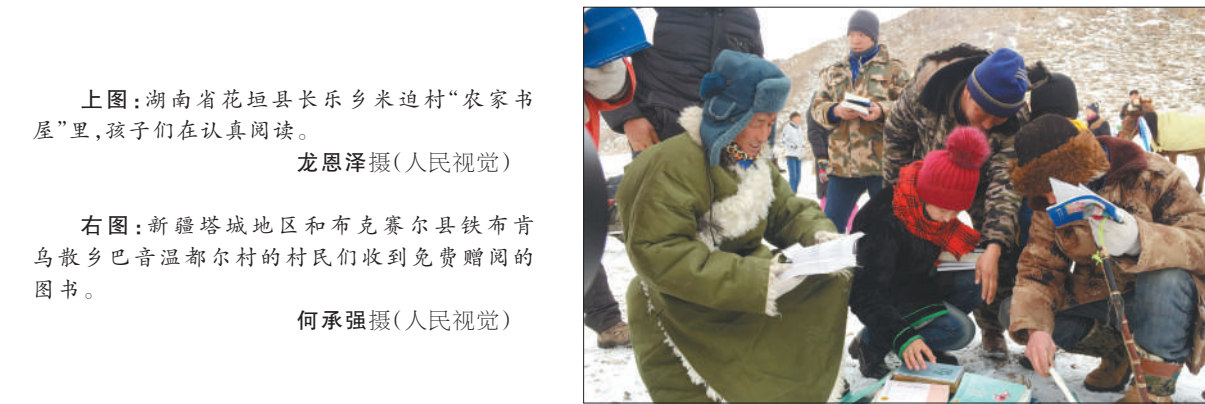
对于58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农家书屋的陪伴就更无可替代的。许多地方的农家书屋把留守儿童组织起来,由专人辅导功课或阅读,成为孩子们课余或假期的新乐园。

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80%的农家书屋与所在地中小学开展“校屋”合作,共惠及农村中小万余人。衢州市利用农家书屋开办“放学书吧”,学生放学后、周末或寒暑假,自愿参加“故事吧”“阅读吧”“手工吧”“小鬼当家吧”“孝行点赞吧”等,书屋管理员、志愿者指导学生开展读后感比赛、讲故事比赛、手工制作、书法练习等活动。大陈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汪衍勤说,留守儿童容易出现情感缺失、学习习惯缺失等问题,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农家书屋开办“放学书吧”既解决了学生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又充分发挥了农家书屋的作用,受到学生、家长和



上图:湖南省花垣县长乐乡米迫村“农家书屋”里,孩子们在认真阅读。

龙恩泽摄(人民视觉)



右图: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铁布肯乌散乡巴音温都尔村的村民们收到免费赠阅的图书。

何承强摄(人民视觉)

学校的高度好评。

提档升级正当时

不可否认,农家书屋10年来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批评个别地区的农家书屋运营管理不善,“门上的一把锁、桌上的一层土、书籍横七竖八”。有媒体报道,农家书屋配书不当,在北方旱作农业区配置了如何种水稻的书。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结合各地经验,推出了一批政策措施,推动农家书屋提档升级。

场地、图书和人是构成农家书屋的三要素,只有三要素都强起来,农家书屋才能强起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关于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强化措施办法,推动农家书屋提档升级,解决部分书屋“闲置”“冬眠”等问题。

农家书屋全面建设时期,各地依托村委会的便利条件,有效实现了农家书屋的全覆盖。但也有不太方便的地方,正如农民自己说,老百姓没啥事谁老往政府跑?不少地方的农家书屋设在二楼甚至更高楼层,不

方便群众借阅。

“让书屋离群众近些、再近些”成为这一轮提档升级的重要工作,各地逐步把农家书屋调整到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使用者集中的地方,把农家书屋从不方便群众阅读的楼上挪下来。如新农村小区、校园周边、农民文化乐园、村便民服务中心、乡邮代办点、文化热心大户等村民集聚的综合场所。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的农家书屋从村委会搬到农户家中或文化大舞台后,借阅率明显上升。今年春节期间,陈家场借阅分点照常开放,仅几天就有500多人次借阅,这样的效果,如果设在村委会是不可能有的。

为了增强图书的针对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把各地推荐目录选用比例由建设阶段的70%降到了补充更新阶段的50%,给地方更多自主权。并调整书目结构,逐步加强少儿类、医疗卫生类等农村急需出版物的供给,其中少儿类图书占比达到35%。同时,围绕图书的阅读使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连续4年组织开展了“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连续3年组织出版社、媒体到河南、陕西、江西、湖北、河北、吉林等地农家书屋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农

村全民阅读。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各地在第一时间为农家书屋配备了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并依托农家书屋深入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交流辅导等专题活动,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民群众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平台。

人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对农家书屋而言,是否选准了管理员对于书屋的开放质量有关键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的农家书屋缺少专职管理员,70%以上农家书屋的管理员由村干部担任,村干部日常工作繁杂,一忙起来,书屋就只好交给“铁将军”把门。目前,一些省份如安徽、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开始试点聘任专职农家书屋管理员或综合文化协管员,每月给予一定经济补贴,提高了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书屋人气渐旺,面貌明显改观。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我们接下来要把农家书屋这项文化惠民工程继续扎实做好,让广大农民在书香的陪伴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金台论道

「故宫跑」为何频频出现

王珏

中国美术馆近日的一个展览火了。这个名叫“美在新时代”展览,展出了包括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等中国名家大师的画作,可谓拿出了中国美术馆压箱底的作品。由于参观人数众多,中国美术馆门前大排长龙,队伍从美术馆门前的五四大街经路口向北,一直排到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对面。人们惊呼,中国美术馆直追“故宫跑”。

“故宫跑”,这个因为2015年故宫博物院展出《清明上河图》引发人们蜂拥看展而发明的词语,出现在今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上,又出现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从博物馆到美术馆,从一个展览到一种文化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优秀艺术作品的热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狂热。

我曾在排队观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队伍里,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狂热。上午一早排队,下午才能进展厅,跑步进故宫,排着长长的队伍,只为一睹“盛世风采”。我也曾在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展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渴望。因为队伍太长,每个人都挤在画前不做停留,人们不得不抓紧每分每秒,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观看。那种对文化的呵护和尊重,对艺术的推崇和虔诚,可感可佩。

但另一方面,“故宫跑”的频频出现,也反映了文化供应,尤其是优质文化资源供应的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博领域需要进一步增加开放面积与时间,策划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和展览,“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资源也需要“供给侧”改革。减少粗放型、同质化文化产品和展览,推出中高端个性化产品和展览,精心设计和策划,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与此同时,博物馆、美术馆还需要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正面对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职能转变。吸引更多观众走进馆内,只是第一步,提供更好的服务,才是真正的考题。比如,面对密集的人流,有没有后续的应对措施,能不能让观众舒适惬意地排队看展,也对其提出了更大的考验。故宫博物院为了应对“故宫跑”,及时改进服务,推出了分发号牌、分时段参观等措施,既合理限制了人流,节省了人们排队的时间,又给看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给人们更好的体验。因此,“故宫跑”也给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精细、科学的要求。

科技的进步,也给博物馆、美术馆等带来了新的契机。如今,VR、AI等新技术已经尝试与各个领域结合。在公共服务方面,这些新技术还有很大空间。新技术的加入,给博物馆、美术馆的规划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也给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和互动,不但可以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也让更多没有机会亲临现场的人感同身受。

微议

保护文物不能盲目

主旋律更加动人心

【事件】日前,国家文物局一位负责同志谈到,传统村落保护虽刻不容缓,但不可一哄而上。

【点评】文化遗产亟待保护不假,但面对具体情况,还是应该强调规划先行、分轻重缓急地实施保护,并采取科学手段。如果头脑发热,盲目地一哄而上,很容易带来破坏性破坏等问题。保护文化遗产是个重要命题,但仍需要用适当的办法去保护。

近期有个新闻,上世纪初,山西省大同市得胜堡村古长城周边村民纷纷剥去长城古堡及城墙上的青砖垒墙建屋。近日,两名村民决定,将自家院墙的青砖拆下补修长城。实际上,因为文物修缮和普通房屋的建造有很大的“技术差异”,村民虽然用的是“原来的青砖”,但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其他材料可能达不到修缮文物的标准,对于文物保护来说是二次伤害和破坏。因此,把专业的文保事业交给专业工作者,这才是应有的审慎态度。

(郑海鹰)

书与人

许联瑛:让梅花品格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史一棋

打开许联瑛的微信朋友圈,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花香气——10条朋友圈动态中,9条都与梅花有关。

你会觉得她是一名花卉爱好者?是,但也不全是。这位北京市东城区园林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会理事,是地地道道的梅花专家。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梅花泰斗陈俊愉提出“南梅北移”的科学构想,以及“北京栽种梅花,不是技术而是观念问题”的论断。许联瑛作为其追随者,带领团队与众多志愿者,为北京引种了100多个品种,向社会奉献了几十处梅花栽植地,让首都市民也能在料峭之中第一时间感受到早春的温暖。

许联瑛听到记者以花香形容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时,她严谨细致地说,“梅花虽然有香味,但却是暗香,不像大多数花卉一样,不是扑面而来的,这样太浓烈了,不合梅花精神。”

她试着用16个字概括梅花精神:自强不息,谦虚自信,为而不争,乐群共

生。“你仔细观察,枝干上绽放的梅花基本上都是朵朵朝下,为此有人用‘竹有低头叶,梅无仰面花’赞叹其谦逊之美。所以,低调的暗香才是梅花的品格。”

翻开许联瑛的简历,在毕业时间一栏上,写着3个年份:1984、1990、2007。看着分散的毕业年份,正是一段不懈追求梅花精神的深造历程。她生于1955年,初中毕业之后,由于时代和家庭背景原因不能继续读书,1976年开始在龙潭公园做一名技术工人。“总不能一直这样没文化吧?”于是,她先后就学于崇文区业余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民建专业、北京林业大学规划设计专业,2007年取得园林在职研究生学历。

一次偶然机会,让她迷醉于梅花以至渐渐不能自拔。“当时,北京园林科研所的陈自新所长对我玩笑说着,你们的研究能让北京冬天见到绿叶和红花,能让植物冬天开花吗?我并未当真。”她微笑着回忆道,“几天后,我见到一则报道,大意是陈俊愉认为北京冬季有望露天开梅花。于

是我拜访了陈先生,与他结缘,也是与梅花结缘。”2005年,她又走进北京林业大学攻读园林规划设计的硕士学位。

几十年来,从长绿色期及冬态有色彩植物在北京园林绿地中的应用,到常绿阔叶植物石楠在北京地区引种示范应用,再到抗寒梅花品种在北京城区园林绿地中的引种和示范应用……她主持的研究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级花卉专业和市、区政府科学技术奖项,她的新书《北京梅花》,又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支持,而这个基金每年支持的项目不超200个。

翻看《北京梅花》,书中系统梳理了梅花的引种栽培历史、形态与生物学特性、品种分类、引种选育、繁殖技术、栽培技术、园林应用等。今年91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对《北京梅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此书是关于我国著名园艺植物——梅花的一部空前的园艺学专著。”

“梅花,经历了中华先民们最初的经济实用、早期封建帝王期待的调鼎和羹,

历代文人墨客热衷的折梅寄情,仁人志士奉行的托物言志,百姓大众喜爱的寓意吉祥等多重嬗变,从来没有因为民族习俗、历史更替而受损或削弱,反而变得愈加深厚与纯粹。”在许联瑛看来,梅花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你可以没见过梅花,也可以分不清梅花、蜡梅,但一说到梅花精神,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两句话。”也许,这正是民族符号和文化基因的作用,是一种融化在民族血液中、不用想起、不会忘记的情愫。

她试图以梅花为意象标本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以此奔走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加入,在了解梅花生物学特性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梅花的文化象征意义,让梅花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发挥作用。

许联瑛年轻时,给自己起了一个字:信芳。人如其字,梅花亦如其字——不是芬芳,不是艳芳,而是信芳,也应是信芳。

本版责任编辑:王珏